

性別化的現代性體驗：《亞細亞的孤兒》及其 恥辱主體^{*}

Gendered Experiences of Modernity: *Orphan of Asia* and the Subject of Shame

林芳玫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臺灣語文學系教授

fmlin@ntnu.edu.tw

摘 要

本期的研究紀要是將已有豐碩研究成果的台灣文學經典名作《亞細亞的孤兒》，以性別與情感社會學的角度，探究主人翁胡太明的內心意識與外在行為。過去的研究大多著重在胡太明的認同，研究結果顯示胡太明具有台灣意識與台灣認同。本文認為，胡太明的台灣意識來自於單戀的幻滅，經由愛上日本女子遭受婉拒，而產生「我是台灣人、她是日本人」的對比與差異，而這種台灣意識又帶著恥辱與自卑的心態。本文意欲探討負面的恥辱經驗如何轉化為正面的主體能動性，並從情感社會學角度分析恥辱、慚愧、自卑、憤怒等情緒所產生的社會與政治功能。

關鍵字：性別、現代化、愛情幻滅、恥辱主體、情感社會學

^{*} 本文為科技部研究計畫（編號 MOST 106-2410-H-003-120-）之初步成果。

一、前言：胡太明對女性的想像與幻滅

《亞細亞的孤兒》是台灣文學最重要的經典作品之一，歷年來關於此書的研究成果豐碩，大多數聚焦於胡太明在台灣、日本、中國三種身分認同之間的掙扎與痛苦；而日本殖民的殘暴也是本書顯而易見的主題。在這兩項共同基礎上，研究者基於自己的立場而選擇強調中國的正面意義、中國的負面意義、台灣意識的崛起等。幾乎沒有一個研究會忽略太明日本女同事久子的重要性：太明愛上久子，被久子以「我們之間是不同的」而婉拒，太明經由這個打擊而首度意識到自己的台灣人身分。久子具有敘事功能上的重要性，用以推動太明對種族歧視的體會以及台灣人身分的自覺。此外，當太明為久子傾心時，他的台籍女同事瑞娥也對太明示好，太明卻不為所動。除了李郁蕙（2002）與宋澤萊（2011），瑞娥這個女性角色被大多數研究者忽略；因此，本研究擬從太明、久子、瑞娥這個三角關係探討性別關係的想像與體會如何形塑太明的台灣人意識。我們必須經由這兩段關係的比較，才能更清楚太明的行為、人格與精神狀況。本書第三個重要女性角色是太明的中國太太淑春，太明也是通過對淑春身為中國女性的想像與實際接觸而反思自身與中國的關係。本研究有別於以往的國族認同研究，以性別為出發點，探討太明如何經由性別化的現代性體驗，及種種負面經驗而產生的恥辱感，進而形成台灣人意識。這種經由負面經驗帶來的身分意識的自覺，筆者稱之為恥辱主體，用以說明太明顛沛流離之下看穿殖民現代性的邪惡而形成台灣人意識。¹本書情節環繞著太明在台灣、日本、中國三個空間的來回移動，太明的性別體驗與愛情的幻滅、對現代化的追求、對身分認同的猶豫，都在具體的空間內展現，也值得我們探討空間對太明的影響。

準此，本論文擬提出以下三個問題：（一）恥辱感如何產生並發揮負面與正面作用，特別是恥辱感如何使太明長期處於自我否定的狀態，卻又於小說結尾處產生主體能動性；（二）太明如何通過與久子、瑞娥、淑春三位女性投射對現代性的嚮往與破滅；其中久子給他帶來的恥辱感如何催生自我意識與台灣人意識更值得深入探討；（三）分析太明對政治運動的嫌惡，以及恥辱感與嫌惡感二者有何關係？二者的連結如何轉化為憤恨，進而帶來能動性？

本研究採取關係性（relationality）與位置性（positionality）的方法，探討太明如何以性別化的現代性體驗，擺盪在現代性的理想與現實之間。對於太明的研究，必須置放在一系列二元或多元對比的人物關係中來理解，不能只是單獨看太明本人，而是太明與

¹ 詹閔旭在研究施叔青小說《行過洛津》時，提出恥辱主體的概念來說明男主人翁性別越界與假男為女的恥辱經驗如何推動自我主體意識之出現（詹閔旭，2012：55-84）。本文恥辱主體的概念來自詹閔旭的啟發。

周遭人物的關係。採取此研究方法的原因是過去研究者忽略其他人物的重要性。在性別經驗這部分，必須研究太明與久子、太明與瑞娥、太明與淑春的三種關係。而前二種關係由於同時發生，因此這兩種關係本身又要互相比較。此外，想要瞭解久子、瑞娥、淑春，也不能只從太明的觀點，而須檢視校長與久子、學校同事與瑞娥、淑春與社交圈及工作環境的關係。藉由重重關係的排比，得出太明在不同處境下的位置及所產生的情緒反應與行為反應。除了性別面向，長篇小說人物眾多，必須全盤檢視才不會以偏概全。

本研究聚焦於恥辱感的形成，因此對「情感」的關注，也是本文研究方法與前行學者不同之處。過往研究對認同、殖民主義的形成及所產生的效果、台灣人集體意識的形成等議題大多忽略情感的作用，本文採取阿梅德（Sara Ahmed）從「情感的社群性」（sociality of emotions）之觀點，探討情感所發揮的效果。學者對情感的看法可分做心理學「由內而外」（inside-out）以及社會學「由外而內」（outside-in）兩種相反的方向。前者著重個人內心的情感如何經由表達而為外界接收；後者則強調社群如何將集體的尊榮感以及倫理規範產生的情感灌輸給個體並由個體內化。兩種取向都將個人或群體視為「具有」情感，情感彷彿是本來就存在的物體。阿梅德認為情感乃是在人我互動中產生，是互動的過程（processes）與效果（effects）。情感是自我與他人的關係所產生，並非具有實體的存有。由人際互動產生的情感製造了表面（surfaces）、界線（boundaries）、效果（effects），並改變身體空間與社會空間（to de-form and re-form bodily and social spaces）（Ahmed, 2004: 8-12）。例如太明的恥辱感將他原本未曾注意到的自我意識與家族關係帶到可被觀察的表面，形成了種族、性別或世代的界線。在空間方面，太明由於單戀日本女同事，將公開的教學空間轉化為私人情慾想像的空間，並區分久子、瑞娥、自我三種不同的身體狀態。所羅門（Robert C. Solomon）指出情感並非只是短暫的神經刺激（如恐懼、疼痛等），情感是長時間的人際互動過程而形成一套敘事，同時也牽涉價值判斷，情感並且是個體與世界交涉（engagement）的狀態（Solomon, 2004）。太明的恥辱感是長期的，並非只是短期單一事件的影響。恥辱是他與外在世界的連結方式：經由負面感覺到身為台灣人面臨的處境，他認為台灣人身分永遠是具問題性的。下文將進一步分析恥辱感與「理想我」的關係，此處先提出太明的恥辱主體之形成與「理想我」的完美主義有關，但因為無法達成理想我而變成自卑與退縮。

二、國內外研究文獻探討：從國族認同到無認同

《亞細亞的孤兒》一書的研究，除了近年荊子馨等少數例外，多年來累積的眾多論文，都離不開胡太明的認同困擾這個主題。此節概述已有之研究成果及其侷限，指出認同研究已達成熟，難以再有新意，但仍值得我們回顧。由於本書牽涉到台灣、日本、中

國三重可能性，各研究者的差異在於把胡太明的最後認同拉向哪個方向。陳映真（1980）強調以中國民族主義立場反抗日本帝國主義的重要性，對太明的懦弱、消極、不介入現實的個性予以嚴厲批判，並對連名字都沒有的配角曾、藍、詹的抗日行動給予正面評價。陳映真認為此書流露出的台灣人意識，若放在中國對抗日本帝國主義的歷史長河來看，只是暫時的特殊性，台灣意識必然是中國意識的一部分。宋冬陽（1984）據此提出相反意見，強調此書對中國的負面描寫，並以多年後吳濁流出版的《無花果》自傳證明吳濁流對國民政府的批判及堅定的台灣意識。

施正鋒（1996）探討吳濁流的民族認同，並提出三種解釋民族認同的觀點：血緣論、權力結構論、共同的歷史經驗。此文延伸至吳濁流《台灣連翹》、《無花果》之出版，用以說明吳濁流對中國的幻滅及台灣人意識之建構。值得注意的是，這篇論文的題目是「吳濁流的民族認同——以《亞細亞的孤兒》作初探」，因而施正鋒關心的是寫作者吳濁流，而非虛構人物胡太明。這犯了與上述宋冬陽類似的毛病，亦即將真實的作者與虛構的主人翁合為一體，忽略文學本身的多義性。

先前介紹的這些論文都顯示出研究者想要以這本小說來證成研究者本身的認同立場，對小說缺乏全面與深入的文本分析，只選取符合自己立場的文本片段來說明。特別是從性別角度而言，太明為何婉拒台灣女同事瑞娥的愛慕？上述研究者只提久子、不提瑞娥，顯示出研究者急於將問題來源定位於日本種族歧視，忽略太明本身的能動性及當時的太明對台灣鄉土的歧視。

荊子馨（2006）在《成為日本人》一書，有專章討論《亞細亞的孤兒》。這一章可說是此部長篇小說研究上的分水嶺。從這裡開始，研究者不再侷限於胡太明的認同問題，採取有別於以往的研究取向。他提出「空間歷史化」的概念，並提問：「最初驅使書中主角沿著這個三角形移動的原因是什麼？」此書在台灣、日本、中國、都會、鄉下等不同空間移動，以空間來表徵歷史，每一次移動都是對當下身分困境的暫時解決，但這個解決往往又導致下一個矛盾，並移轉到另一個新的地域。

彭瑞金、李育霖也都提出對太明空間移動的看法。太明的移動看似逃避問題，但彭瑞金（2008）指出，出走也是一種承擔。李育霖（2008）則認為，太明遇到種種困境，只要能往前走，明知無路可走也要出走，這是弱者的反抗與勇氣。李育霖接著提出「無認同」的看法，認為太明經過種種試煉，證明任何一種認同都是不可能或充滿矛盾的，因此最後來到「無認同」的處境。

李郁蕙（2002）跳脫國族認同的研究框架，正視性別於此書的重要性。她指出前行

研究者的盲點，他們將日本視為觸動太明重新認識祖國的契機，然後專注於太明對中國的幻滅，最後再得出台灣人意識的結論。李郁蕙認為中國具有雙面性，而日本也同樣具有雙面性：對台灣人而言，日本一方面是令人憎惡的殖民者，同時也是冀望同化的目標與對象。太明透過兩性差異的體驗來理解日本與中國，並以家族中女性角色與地位來理解自身鄉土。她提出「性差化」與「地政學」兩個概念，用以說明胡太明如何以兩性差異搭配地理空間的移動，形構其某一特定人生階段的自我意識。這篇論文正是筆者想要採取的切入點。

延續前述幾位學者跳脫認同研究框架，黃信洋（2009）以不同的角度回到認同議題。他的提問是：多重認同為何總是會出現矛盾、痛苦、衝突？他從多元文化主義的角度指出，現代社會的人們本來就會有多重身分認同，可以兼容並蓄，不一定以衝突與痛苦收場。藍建春（1997）對太明的看法集中在其漢文化祖國意識的瓦解與再擬構，淑春在此扮演重要角色。雖然藍建春聚焦於祖國意識與經驗，卻與陳映真反抗帝國主義的中國現代民族主義不同，他強調的是文化面的漢人意識。最後，宋澤萊（2011）提出《亞細亞的孤兒》一書呈現三種否定：對田園土地的否定；對愛情的否定；對英雄的否定。太明經過種種痛苦失敗經驗，最後有了悲劇性的主體之初萌芽。宋澤萊悲劇主體初萌芽與筆者的恥辱主體看似雷同，不過悲劇主體的當事人並非懦弱，反而是勇於承擔，面對無法扭轉的命運採取有尊嚴的態度來面對。相形之下，恥辱主體總是被動地受外在牽制以致於不斷產生回應式（reactive）的情緒諸如：憤怒、羞恥、抑鬱、不安，因而無法產生有效行為來處理困境；他冀望別人以有尊嚴的方式對待他，但自己無法給自己尊嚴，而讓各種負面情緒牽制。

荆子馨（2006）指出，胡太明的空間移動並未朝向更高的目的，也不能帶來救贖、解放或自由。即便如此，在絕望的情境下，只要是一個移動，也是抵抗。胡太明追求的是「無認同」，也就是認同的不可能性，並從認同的牢籠逃脫出來，達成背叛或逃逸。

蔡建鑫（Tsai, 2013）從「移民」的角度，以此書作為王德威後遺民論述與史書美華語語系研究的對話工具。台灣重層的移民史造成「遺民意識」，並衍伸為孤兒意識。綜合上述各方論點，早期研究注重胡太明台灣、日本、中國三重身分意識與認同的糾葛。陳映真將此糾葛導引向中國民族主義的解決方向，而陳芳明與施正峰等則偏向台灣意識。後期研究跳脫太明最後究竟認同什麼的問題意識，改為空間移動、無認同、性別差異、悲劇主體、多重認同的可能性。筆者的研究則朝向空間的歷史化、空間的民族化，並連結空間與性別的關係，探究太明如何因愛情的憧憬與幻滅而形成恥辱主體，而其恥辱經驗與愛情經驗也促成他在不同空間的移動。胡太明如何興起對愛情的憧憬？又為何幻滅？這些負面經驗如何形塑恥辱主體的生成？久子、瑞娥、淑春是否具有國族隱喻的意

涵？這是下一節的探討主題。

三、愛情與恥辱感：性別化的現代性體驗

太明通過性別關係來比較台灣、日本、中國的差異，而非直接面對三地的政治、社會、文化事實。此外，他的性別經驗往往是先以「想像」、「遐想」的方式開始，實際接觸不多。一旦實際接觸，就產生幻滅以及對自身與對他人的嫌惡，形成恥辱主體而進行一場空間上的移動與追尋。反過來說，空間也導引他對女性的想像。

久子是太明的同事，太明通過久子投射對現代性美好的想像。雖然他被久子的體態所吸引，卻很少與她互動，而是沈醉在自己的幻想，將久子定位於「有教養」的精神狀態。太明的同事瑞娥，一位台灣女性，愛慕太明卻被他嫌惡。太明於居留中國南京期間與自己的女學生淑春相戀成婚，婚後又迅速對此關係幻滅。久子、瑞娥、淑春三位女性形塑了太明對日本、台灣、中國三種空間、三種不均質發展的現代性之直接體會。²久子代表美好的現代性，卻因台日種族差異而無法發展親密關係，並催生太明的恥辱主體；瑞娥的肉體有如台灣鄉土，是相對上落後的，也提不起太明的興趣，代表被殖民者自卑情結之悖反——優越感；換言之，太明對瑞娥抱持優越感；淑春具有中國古典文學之美與現代性，代表太明主觀認定中的祖國文化之美以及當時客觀現實下新女性參與公共領域的現代性，後者卻也是太明所不屑的（跳舞、打牌、交際、街頭演說）——另一種優越感的表現。眾多研究者都指出太明的自卑，卻未看出殖民地扭曲人格下，種族身分上的自卑有可能與性別關係上的優越意識結合。太明依據互動對象之不同，有時自卑、有時充滿優越感；同時，全書大部分情節中，太明一直被恥辱感包圍。以下筆者分析太明與三位女子互動過程。

（一）日本女性久子：理想我的投射

太明、久子、瑞娥三個人物形成兩組可供比較的關係。太明單戀久子，並由此而產生恥辱感。瑞娥對太明有好感，太明反而嫌惡瑞娥。在此先說明恥辱感的特色。主體對他者產生興趣，期待他者給予正面回應，但這種期待落空而使主體有被孤立的感覺，並進而自我厭惡而想要躲藏起來。阿梅德較強調「隱藏與逃避」，而賽菊克（Eve Kosofsky

² 三個女性所代表的三種空間並非一對一的同質對等，而是意符（三位女性）與意指（三種空間）之間錯綜複雜的交錯、斷裂、重疊的動態關係。三個女性或三種空間並非各自以外部分異、內部同質的方式存在，而是各有內部的異質性，同時又有類似元素流動於三位女性或三種空間之間。因此，久子、瑞娥、淑春都指涉多重而曖昧的意義。

Sedgwick) 則將羞慚詮釋為想要重建人際互動的慾望。賽菊克認為恥辱感是認同作為一個問題的生成之所，而這是以「原初性」與「關係性」的方式所呈現 (Shame is the place where the question of identity arises most originally and most relationally.) (Sedgwick, 2003: 37)。請注意，賽菊克並非認為恥辱感造就認同本身，而是恥辱感是認同成為一個「問題」的生成之所在。太明愛上久子，於是意識到自己是台灣人、對方是日本人。太明愛上久子並非表示太明想要成為日本人，而是相反，他更敏銳的察覺自己的台灣人身分，但是這樣的身分對太明而言卻是問題與苦惱。反之，與瑞娥在一起，卻不會因為台灣人身分而煩惱。所以身分認同是以「關係性」的方式以「問題」、「苦惱」、「憂慮不安」的面貌呈現，並將身分的問題、恥辱與原初的「血液」連結。恥辱感因而具有雙重面向：令人痛苦的個體化，以及難以控制的關係性。太明面對久子會有恥辱感，面對瑞娥沒有，因此恥辱感並非主體本身的存有，而是發生於特定關係中 (Sedgwick, 2003: 37)。

太明、久子、瑞娥三人都是學校同事。在排練學生的音樂與舞蹈活動時，久子跳起「羽衣舞」，令太明迷醉於她的優美體態。弔詭的是，雖然視覺上的刺激勾起太明的情慾，他又喜歡「閉上眼睛」而進行更多的自行想像。

「多麼美麗的玉腿！」太明看得目眩神迷，不覺閉上兩眼輕輕地讚嘆了一聲。

可是他的眼睛雖閉上，然而那雙潔白的玉腿卻依然以柔美的曲線，在他的瞳仁間描摸著姣美的舞姿。那是豐腴溫馨的日本女性的玉腿，而那優美的舞姿，猶如隨風飛舞的白蝴蝶。(頁 34)³

他的感情越衝動，越使他感到自己和久子之間的距離——她是日本人，我是台灣人——顯得遙遠，這種無法填補的距離，使他感到異常空虛。(頁 34)

「她是日本人，我是台灣人，這是任何人無法改變的事實。」

他想到這裡，胸間不覺引起一陣隱痛。(頁 35)

這種對日本女性美的崇拜，反而勾起太明更深的自卑感：

自己的血液是污濁的，自己的身體內，正循環著以無知淫蕩的女人作妾的父親的污濁的血液，這種罪孽必須由自己設法去洗刷……

³ 本研究之《亞細亞的孤兒》採用遠景 1980 年出版之版本，由於多次引述，僅在引文處標示頁碼。

太明內心的格鬥，使他徹夜不能安眠。(頁 36)

當太明鼓起勇氣向久子告白，久子只說了簡單的一句話，但這一句話足以讓太明整個世界爲之崩塌：

「久子小姐！妳……對我的看法怎麼樣？」

經過片刻的沉默——但那時間卻像無限地久長，太明抑制住怦怦跳動的心，只聽見久子斷斷續續地，但很清晰地說：

「我很高興，不過，那是不可能的，因為，我跟你……是不同的……」

什麼不同？這是顯而易見的，她當然是指彼此民族之間的不同而言的。

「天哪！」太明的心裡狂吼了一聲，腳下的地殼像要崩潰似地，這是多麼痛苦而絕望的裁判啊！（頁 60）

以此段情節可能被用來證明、批判日本的種族主義與種族歧視。但若觀察全書脈絡，太明在久子表態前就先給自己宣判死刑，單戀與恥辱感互相交纏，甚至認爲自己血液不潔；而其血液污濁的原因乃是其父與淫蕩的女人來往並納爲妾。太明問：「久子小姐！妳……對我的看法怎麼樣？」這句話顯示他強烈需要久子的認可，也印證了主體發現自己的缺陷與不足。「自我意識到自我」就是主體萌發的片刻，久子觸動太明自己意識到自己，而此種意識，包含父親娶妾所帶來的判斷：自己的血液是污濁的。

從男性心理學的角度而言，小男生成長過程必須經歷「想要擁有女人」以及「想要變成某種理想中的男性」(Ahmed, 2004: 126-127)。胡太明似乎沒有可追尋的男性典範，卻一直以「想要某種類型的女人」來形成主體。與其說胡太明想要變成日本人，不如說他「想要擁有日本女人」。太明在日本不想偽裝成九州來的日本人，而是希望可以直接說出是台灣人。因此太明的台灣認同是簡單而本質性的，直到單戀久子，他才由恥辱感而反思台灣人的地位。

阿梅德指出，恥辱感其實與慾望有關：一個人對另外一個人產生興趣，很在意對方對自己的看法，才會產生恥辱感。從心理分析角度而言，小男孩「認同」父親 (identification)，想要成爲「像是」(be like) 父親那樣的人，故認同是建立在「相似」的基礎。而小男孩希望「擁有」母親，這涉及「理想化」(idealization) 的過程，也就是

以「差異」為基礎。這種將慾望對象理想化的過程，與對象本身的特質無關，而是當事人的「理想我」(ego-ideal)之投射。久子代表差異，也是太明對理想我的追求。正因為太明太過於在意久子，所以會想像久子看出自己的不足，這種想像出來的不足，足以顯示太明對理想我的渴慕。從心理分析角度而言，太明的爺爺，而非父親，是太明認同的對象；而久子則是被理想化而成為太明「想要擁有」的對象。代表漢文人的爺爺與代表現代性的久子，說明太明對於理想化的殖民現代性之追求，然而此時的他，尚無法區辨殖民現代性與現代性，對於殖民體制造成的「台／日」之分有感知卻無批判。一直到小說末端，恥辱主體才看出殖民體制的邪惡而展開批判思維。

根據阿梅德進一步指出，恥辱感是「自己意識到自己的不足」，與罪惡感不同。罪惡感是認為自己做錯某事，與過去「行動」有關(做錯事)，也可以於未來彌補。恥辱則是對內在自我的素質之評價，認為自己很卑劣、無能、所做一切都是失敗。恥辱感一方面產生了自我意識，雖然是負面的自我意識，另一方面又使主體想要逃避自我，想要隱藏自我，以免被別人發現。這恰恰是因為主體已經被暴露於別人的眼光與價值判斷(別人的眼光也許是真實的，也許是主體自己想像的)。恥辱主體因而經歷了兩種矛盾：首先是自我耽溺與逃避自我，再來則是暴露與隱藏。主體認識到自己的不足，這又牽涉到「見證」的過程(witness)：主體認為他人目睹了自己的缺點，因而更加羞慚(Ahmed, 2004: 103-104)。恥辱感是自我與自我的關係——認為自己卑微充滿缺陷；恥辱也是自我與他者的關係——想像他者對自我有負面評價。恥辱感並非個人所擁有的內在特質，也不是存在於外在他者賦予當事人恥辱感，而是人際互動過程中，自我對此過程的評價。太明在久子面前特別感到羞愧，並非久子真的講了歧視太明的話，而是太明意識到自己與「理想自我」(ego-ideal)的落差而產生負面判斷。以下先從太明與久子的互動說明恥辱主體與情慾的關係。

傑可畢(Mario Jacoby)從榮格心理分析的角度指出恥辱與自尊是一體的兩面，而追求自尊首先必須進行「個體化」(individuation)以及「區隔化」(differentiation)。在兒童時期(以及以後各階段的人生時期)建立自我個體的時候，若遭到阻礙，則個體無法充分發展而停滯於羞恥與焦慮之中。要克服這些阻礙以及消除恥辱感，自我必須認知到「理想我」與「現實我」的差距，脫離完美主義，接受自己的缺點(Jacoby, 1994: 103-105)。久子是太明投射出去的理想我，經由性別與種族差異帶來個體化。雖然殖民政府建立了外在的種族差異與種族歧視，但弔詭的是，太明需要這種性別與種族的雙重差異來建立自我個體。久子會吸引太明，不只是久子個人具有「優雅的體態」，而是久子才能帶動差異化與個體化。但久子畢竟拒絕了太明，原因就是「差異」，殖民體制經由差異而催生了「我是台灣人」的意識狀態。相形之下，吳濁流從未以「台灣人」來形容胡爺爺。久子帶動太明的台灣人意識，又拒絕他的追求而帶來傑可畢所說的「障礙」以及恥辱感。太

明的恥辱感由「情感障礙」造成，但恥辱感本身不是固定的物體，反而進一步將太明推向移動，促使他前往日本留學。恥辱主體是動態的，持續與世界交涉。

（二） 瑞娥：落後的台灣鄉土

太明的另一位女同事瑞娥同是台灣人，她對太明有好感，太明反而更加嫌惡。

這時，他的視線恰巧落在站在旁邊微微喘息著的瑞娥的酥胸上，距離近得幾乎可以接觸得到了。

近來，太明對於瑞娥有意和他表示親近，並非完全不覺得，有時她的表情幾乎有些近於獻媚。但太明總覺得無意和她親近，他的內心雖然深以不能接受她的愛意為歉，但事實上卻是愛莫能助。如今，太明的心目中，正潛伏著內藤久子的倩影，因此他根本無暇考慮或顧及其他的事；瑞娥對他表示的柔情，反而使他覺得有些累贅和厭煩。（頁 33）

太明對於瑞娥這種過份想討好別人的樣子，心裡著實有些煩膩，一時竟不知怎樣回答纔好。也由於對瑞娥的煩膩，益發覺得久子值得思慕和景仰。（頁 41）

太明遭受久子拒絕後，心情沮喪，決定換個環境到日本留學。他從基隆搭船離台，意外發現瑞娥專程來送他，此時，瑞娥在他眼中成了家鄉的象徵，讓他感到溫馨，也很感謝瑞娥送他的護身符。

太明對於瑞娥出其不意地來送行，感到異常欣喜，他從沒有覺得瑞娥像現在這樣可愛過。（頁 63）

當太明著迷於久子時，兩位女子是「酥胸」與「美腿」的對比，而美腿並不只是肉體之美，而是進一步連結到羽衣舞的流暢與優雅；相形之下，酥胸就成了單純的肉感，缺乏質素。兩位女性的對比折射出太明既自卑又自大的矛盾。一旦與久子的結合可能徹底破碎，瑞娥的位置就不再是久子的反襯，而在太明離台的瞬間成為故鄉的溫暖。但故鄉是什麼？太明未能深入瞭解瑞娥，也同樣不瞭解家鄉。他一生都大部分是由別人否定他所帶來的「我不是誰」的負面定義。

如前所述，太明對台灣的認同是很本質主義式的；因為生長在台灣，所以是台灣人。但全書他經常流露出對台灣人與台灣習俗的不滿。瑞娥代表了台灣鄉土的鄙俗；家族慶

典與宴客時演奏傳統音樂、唱山歌也令太明厭惡。此時他又站在一個優勢位置，看待令他煩膩的台灣女性與土地。

瑞娥引起太明反感的原因若深入分析，可看出恥辱感形成過程中「見證」(witness)的重要性。由於太明、久子、瑞娥因為是同事而常在一起，太明認定了瑞娥可看出自己單戀久子。其實吳濁流從未點出瑞娥對太明與久子的關係有何看法，一切都是太明自認為瑞娥看出他的情感。恥辱感因而是暴露與隱藏的辯證，也是自我對人際互動的想像。阿梅德認為情感是「過程」而非存有，彰顯出表面與界線。太明的恥辱感讓他的自我意識浮出表面而能覺察到自我，同時也因為恥辱感而有了傳統與現代、台灣人與日本人、現實我與理想我的界線之分。

太明對瑞娥的主要情緒反應是嫌惡。嫌惡(disgust)的情緒來自於「鄰近性」(proximity)：因為太靠近了，所以才厭惡。太明討厭的並非瑞娥這個人，而是瑞娥主動靠近，破壞太明想要保持的距離。太明以後對中國妻子淑春的感覺也是以嫌惡為主，對於藍與詹組成的反殖政治團體也是嫌惡。全書最主要的情緒是恥辱感，其次是嫌惡，筆者於下文分析太明的嫌惡感與政治運動間的關係。

四、 淑春：太明對文化中國的嚮往與對政治中國的嫌惡

一向採取鮮明抗日立場的陳映真，在《亞細亞的孤兒》的序言裡，連次要角色藍、詹、曾的抗日活動都給予正面評價，卻對淑春抗日活動毫無評析(陳映真，1980：45-62)。陳映真的性別盲點，也是印度後殖民學者洛克瑞希南(Radhakrishnan)所指出，在性別與國族主義政治二者之間，缺乏政治與認識論二者的結合，女性因而成為一則關於失敗的寓言，而此失敗，就在於追求民族解放的行動者，只注重政治面向，未能內在的瞭解自身性別化的歷史(Radhakrishnan, 1992: 77-95)。也就是說，陳映真執著於中國民族主義，卻未能瞭解中國民族主義內部關於性別的歷史。久子、瑞娥、淑春不只是女性人物，也是筆者用以從文本中挖掘出日本殖民主義、台灣人意識、中國抗日活動三者各自的發展過程及其對太明恥辱主體的影響。

太明留學日本後返台，找工作並不順利。以前的同事曾先生在中國發展，已經成為曾教授，在他的鼓勵下太明決定到南京擔任日文教師。太明先到上海、再到南京。儘管他不喜歡上海的嘈雜，卻對上海女學生一下子就有好感，又再次對比台灣女孩為「粗野」。他眼中的上海女學生結合了古典與現代兩種特質：

從她們的摩登裝束中，散發著高貴的芳馨，似乎蘊藏著五千年文化傳統的奧秘。

她們所穿的優美上海式女鞋、女襪，以及所提的手提包……，全身上下的色調，都能配合自己的趣味。由於儒教中庸之道的影響，她們並不趨向極端，而囫圇吞棗地吸收歐美的文化；她們依然保留自己的傳統，和中國女子特有的理性。太明像著迷似地凝視這些女學生，她們那纖細的腰肢、嬌美的肌膚，以及神采奕奕的秋波，不禁使太明墮入迷惘的遐想中。（頁 121）

她們（筆者按：上海女性）這種細緻謹慎的態度，和台灣女性那股粗野的勁兒相比，真不啻有雲壤之別。（頁 122）

上海只是暫時經過的地方，太明的目的地是南京，老友曾教授已替他牟取一份教授日文的教職。太明愛上自己的學生淑春，並鼓起勇氣約淑春出遊。他眼中的淑春是以下的面貌：

她那柔肩以下全部裸露著的白潤的玉臂，那線條多麼優美柔和！它與青蔥的綠葉相映成趣，更顯得嬌嫩欲滴，嫵媚動人。太明焦急地渴望著有一天把青春的胴體占為己有，擁入自己的懷抱。（頁 144）

接下來的情節環繞著兩人約會的足跡，遍及南京著名的景點，作者的遣詞用句也有如羅曼史，寫出戀人的甜蜜，最終戀愛成功，兩人結婚。

但是接下來的發展則是反羅曼史：兩人婚後衝突日增，漸行漸遠；淑春是所謂「新女性」，婚後在外交部工作，熱衷於與同事應酬、跳舞、飲酒、打牌，「儼然以女王的姿態」周旋於外交部男同事間（頁 151）。太明希望婚後淑春以主婦的身分料理家務，遭到淑春反駁：

「你的頭腦怎麼像老頭兒一樣地封建呢？」（頁 150）接著，她又發表許多偏激的意見，說什麼男人不應該把妻子當作訂立長期契約的娼婦，太明聽了什麼話也說不出來，內心感到異常空虛和寂寞。（頁 151）

此處，作者從太明的觀點來看淑春，視其觀點為偏激。淑春是典型的新女性，不但有男女平等的前衛思想，也注重時髦的穿著與活躍的社交娛樂生活。同時，在外交部工作的淑春也熱衷政治，甚至在街頭發表抗日演說，而太明對妻子的演說則是不屑與反感：

他對於妻那種毫無理論根據而僅把別人的宣傳依樣畫葫蘆地轉播給民眾的不負責任的行為，感到異常憎恨。(頁 166)

淑春街頭抗日演說此現象折射出民國建立以來婦女參政議題與興國、報國論述的結合(李木蘭著、高亮譯，2007：177-201)。淑春是晚清與民國時期「新女性」出現下的時代產物：新女性接受現代教育，攸關中國現代性計畫的成敗，卻也引起男性焦慮感，擔憂走入公共領域的新女性忽略家庭角色(梅嘉樂著、孫麗瑩譯，2007：256-310)。太明的心態，必須放在新女性現象的社會與政治意涵來理解，並探討男性焦慮感的成因。

作者持續以太明眼光看待淑春。這裡研究者面臨一個很大的挑戰。這些對淑春的負面評價，究竟是單純的太明想法？或是這裡有作者聲音？作者是否與敘事者合體？以太明為說話工具，發表對淑春的負面意見？從與淑春第一次邂逅開始，作者就描寫太明的盲目。他看到淑春在火車上的行為(穿著鞋子踩到座椅上拿行李)，對此行為不以為然，卻反而更加迷戀素昧平生的陌生女子。作者描寫太明在迷戀一位女性時就會接受她所有的行為，顯示太明的盲目與矛盾，因此作者拉開與太明的距離，暴露出這位男性的非理性。因此，當他婚後期待淑春在家操持家務，淑春不客氣的指責他頭腦封建。種種情境都指向太明在兩性關係中總是一廂情願，沈溺於自己的想像，無法與女性展開真正的溝通與對話。作者描寫淑春愛慕虛榮，耽溺於打牌跳舞等物質享受，對照另一位人物曾教授為了打牌而不顧小孩生病哭鬧，這方面又比較接近作者聲音，批判當代中國人日常生活的頹廢。

淑春的轉變，也代表太明對中國的認知從文化層次轉向政治與社會的現實。太明從小接受爺爺的漢學教育，對中國古典文學與詩詞有深厚的素養。正因為漢學的素養，使他對現代性產生好奇，但並非通過閱讀新學來理解現代性，而是透過愛慕久子。在淑春這部分，他把古典文學的想像投射到當代中國與中國女子。他搭乘的船靠近上海時，太明心情激動而當場寫了一首漢詩，並以「歸故國」來形容自己的心情，但他隨即意識到他是「日本國民」，因此把「歸故國」改成「遊大陸」(頁 118)。這些詞彙的斟酌顯示太明已經具有現代民族國家的國民意識，但仍停留在相當表面的層次，其心靈深處還是受到中國古典文學的召喚。

他初抵中國時，中國、古典文學、中國美女三者是相連的：

中國文學的詩境，似乎可以由女性表達出來，並且自然流露著儒教所薰陶的悠遠的歷史，這些都是把古典型的高雅的趣味，活用於近代文明之中的實例。(頁 122)

同時他也開始認識到中國的社會現實，這令他訝異，但在這第二階段的負面感受，仍無法推翻第一階段的文化中國、古典中國、中國美女三者之連結。中國社會到處是乞丐，而當地的朋友對成群的乞丐無動於衷，絲毫無憐憫之心，太明對於乞丐主動需索而朋友毫無反應地帶他離開，感到不解與尷尬。同時，他也發現宣稱要努力建設中國的曾，在日常生活中沈迷於麻將，連小孩發燒生病也不顧。

太明真正的幻滅來自淑春婚後的轉變。淑春不只喜歡社交應酬、跳舞、打牌，最令太明厭惡的，是淑春在街頭從事反日、抗日演說。淑春從第一階段的古典文學美女，化身為當代中國的國際關係與政治。對於日本的侵華野心，當時中國分為主戰派與主和派，而前者佔上風。太明認為中國軍備不足，並無與日本開戰的實力，因此對妻子的主戰演說深惡痛絕：

他們都口口聲聲高喊著抗戰，但對於兩國的軍備卻絕口不提，他們都認為戰爭就可以解決一切。太明對於這些以宣揚不負責任的理論去煽惑民眾的政治掮客，仔細想想，不覺毛骨悚然。他很了解自己的妻，她不僅毫無軍事常識，就連自己國家的軍備情形也一無所知，然而她居然也高唱主戰論，真使他痛恨不已。(頁 166)

太明對中國的認識經歷三個階段：文化中國與古典美學、社會現實、政治情勢。淑春代表了第一階段與第三階段兩種逆反的現象。太明固然厭惡主戰言論，但這份厭惡是否更大程度來自於他自己的妻子拋頭露面在街上演說？綜觀全書，太明從一開始就對各種政治言論活動都很反感，例如剛到學校教書時同事抱怨日本校長歧視台籍老師，或是留學日本時遇到熱衷反殖運動的台灣人藍與詹，然而這些反感的強度都不如他在南京所見。他一廂情願地想像古典中國，被迫面對中國的反日情緒與主戰論，其不屑的態度又使他略帶優越感。「妻子的丈夫」這個位置強化他的優越感，以私領域的傳統男性優勢來蔑視公領域的現象。淑春本人並無矛盾，而是一開始就是太明自己對古典文學的投射。作者一貫地呈現出太明對政治的游移疏離，以及公領域與私領域的混淆不清。雖然作者不乏對太明的同情，卻也微妙地批判了太明自卑與驕傲的弔詭。面對大中國，太明只能以「丈夫」的角色來回應淑春的政治立場，判斷其為幼稚與不負責任。

對淑春的失望加上對中國的失望，以及被當地政府視為間諜而遭拘禁，他對中國徹底幻滅。成功逃亡回台灣後，面對皇民化運動下，日本積極增加對台人經濟與日常物資的掠奪，太明此時終於覺悟到日本殖民體制的殘酷。對照他初任教師，對同事批評日本校長感到不安，中國、淑春、與殖民政府直接的交涉，這些恥辱的經驗都逐漸促使太明的恥辱主體越來越富有能動性，並開始展開行動。這些行動包括：替米店老闆應付官方檢查員（頁 193-195）、到水利合作社去爭辯水田政策（頁 214-215）、幫母親藏米等等

（頁 221-222），這些行為將於本論文稍後再深入分析。

五、恥辱主體的覺醒與能動性的生成

本書名為「亞細亞的孤兒」，「孤兒」來自對「家」的想像，那麼太明來自怎樣的家庭呢？筆者認為太明是多重的孤兒。首先是他原生家庭的分裂；其次是接受日本帝國主義式的國民教育，認為自己是「日本國民」但又親自經歷一連串殖民政府的暴力；再來是自己婚姻的失敗，使他與淑春所生的女兒形同孤兒；最後是他以古典文學來建立與「故國」的連結，卻發現「故國」其當代政治處境將台灣人視為間諜。「國民」身分的感知往往先來自於私領域的人情網絡，特別是家庭關係，影響當事人的人格與行為模式。太明屢次遭逢家庭不幸，他只能消極地哀嘆，拿不出行動力，預示了他日後在政治上的懦弱。

太明由家族關係而產生的恥辱感最早來自爺爺的影響。傳統漢文人胡爺爺，本身的性格就是自尊心很強而導致容易覺得受辱，卻又拿不出對應之道，影響太明自小就養成「習得的無助」(learned helplessness)之消極行為。例如幼年時與爺爺參觀元宵節燈會，由於人潮洶湧，導致日本警察持棍維持秩序，不小心打到胡爺爺。胡爺爺認為自己受到侮辱，回家後心情抑鬱而臥病在床。多年後爺爺因家族祭祀公產爭議而傷心難過，太明對此爭議拿不出解決辦法，在爺爺傷心過世後，「爺爺一死，太明的心靈就像被挖掘了一個窟窿似地，感到無限空虛。」（頁 89）

太明的父親看上一位女子而想要納妾，此事讓太明覺得自己的血液是污濁的，並且在單戀久子時把自卑感與父親娶妾連結在一起。某次全家去照相館照相，母親不知道日本人入內脫鞋的習俗，被照相館的人責罵。太明既沒有向老闆抗議，也無法將其視為小事，而是由此又升起屈辱感：「太明由於憤慨和羞辱，氣得滿臉通紅，為了自己的疏忽，竟使母親當眾出醜，內心感到非常不安；對於那婦人的侮辱態度，又覺得相當憤恨。」（頁 114）某日母親阿茶發現自家祖墳被挖掘，上前質問而被攔一巴掌，太明不敢和對方理論，「太明越想越憤恨難平，母親雖然沒有受傷，但太明的心靈上，卻已經受無法治癒的深刻創傷。」（頁 108）過往被淡忘的負面經驗，「一遇上心靈受到新的創傷，那已經埋葬下去的古老的記憶，便會和新的憤怒同時爆發的。」（頁 108）

太明情緒結構的主要成分是恥辱，其次即是嫌惡。書中經常出現「厭惡」、「讓他覺得噁心」等字眼。除了瑞娥肉體的靠近引發太明的厭惡，本書中太明厭惡的對象都與政治團體與政治運動有關。阿梅德對嫌惡(disgust)分析如下：嫌惡與「鄰近性」有關，若非藍與詹等人主動找他，太明對政治無感，也不會有嫌惡的情緒。

嫌惡來自於兩種相反的運動：朝向某物、然後又抽身。嫌惡與賤斥（the abject）有關。怎樣的狀況引起我們的賤斥呢？它呈現出威脅性，本來來自於外在，但卻被感知為已經存在於自身內部，於是想把自身內部的「非我」以嘔吐的方式排除。真正讓我們感到受威脅的因而是外在與內在的界線被破壞，界線本身成了嫌惡的對象，如物體般的存在。這些物體與其他物體接觸，這種接觸也成了嫌惡的對象（Ahmed, 2004: 85-86）。

太明第一次當老師時，台籍同事對太明抱怨、批評日籍校長歧視台籍教員，太明感到不自在（頁 28-30）。他厭惡這種背後的評論，此種言論違反了職場上部屬與長官的界線。這種嫌惡感也意味著太明未能理解殖民體制下的種族歧視。他到日本留學時，原來很高興碰到同鄉藍，但是藍與詹在日本辦雜誌、組織政治團體、批評日本殖民政策。藍遊說太明加入政治團體，引起他的厭惡（頁 71-72）。作者吳濁流雖然描述太明對政治團體不以為然，但太明真正覺得不自在的是藍遊說他加入。同鄉的情誼被政治熱情取代，正是這種內在於自身的私領域同鄉情誼變質為向外投射的公領域活動，公私的「界線」被破壞，而藍帶著他四處「接觸」各種政治集會，引發他的憎惡與賤斥。不久之後，藍又帶他參加東京的中國同學會，會場上反日的政治氣氛又讓他感到不自在（頁 75-78）。太明回台後，遭逢戰爭末期日益緊張的戰時體制，一位反對殖民政府的在台日人佐籐引介他參與某文藝團體；當他聽到這群文人談論文學理論與歐美文學，他本來很欽佩。等到他聽到這群文人轉向皇民運動議題，並展示自己寫的配合政策的標語，太明覺得這些標語「膚淺、幼稚、肉麻不堪的東西」（頁 258-259）。

最後這個事件非常值得重視。雖然太明全書從頭到尾不斷對各種政治言論、政治團體、政治活動感到憎惡，但是對於皇民奉公會成員吹捧日本帝國主義政策，他的厭惡到達極點，也恰好就是在此時刻，原先服從於殖民體制而不自知的太明，逐漸開始覺悟到殖民體制的邪惡。此時，太明的情緒已經多了「義憤填膺」的性質，也預告了他之後逐漸展開能動性，並於書末「佯裝」發瘋而將恥辱主體的質變與能動性推向高峰。⁴

雖然全書充滿太明的負面情緒，但我們可以觀察到太明於本書最末同樣的負面情緒如羞恥、嫌惡其對象已有不同，太明也開始有行動力。以前他對台籍同事批評日籍校長感到不自在、久子讓他有恥辱感、藍與詹的政治團體令他嫌惡，這些都顯示他受殖民地教育影響，以殖民者的眼光來看待自己與同胞。但是到了戰爭後期與皇民化時期，他厭惡的對象已轉移到殖民政權本身以及趨炎附勢的台民。

曾令他嫌惡的政治團體，當他們的演講活動遭警察制止，支持官方的劉保正發言批

⁴ 大多數研究者認為太明發瘋，陳映真則認為是「佯狂」（陳映真，1980：58）。

評這群團體，太明覺得他很噁心（頁 102-103）。皇民奉公會成員寫政策標語，也被太明視為幼稚肉麻（頁 258-259）。台大一群教授失去知識份子的風骨，鼓吹皇民政策，因而台大被形容為「豺狼大本營」。

太明也開始有了行動力。戰時稻米不足，政府派了檢查員來抽檢稻米是否含有雜質，檢查員卻趁機勒索。太明剛好在米店，除了擔任翻譯幫米店老闆解圍，也積極與檢查員交涉、說理（頁 194-196）。接著是水利合作社禁止胡家在自己的產業上種香蕉，又要他們廢止池塘；太明並未立即服從水利合作社的規定，反而專程跑一趟合作社辦公室，與其說明廢止池塘的害處（頁 214-215）。殖民政府派員到各家搜索有無私藏稻米，太明母親被查到藏米，太明也挺身而出替母親說話（頁 212-222）。

太明的情緒原本由恥辱、羞慚、嫌惡主導，但他後來發展出罪惡感與義憤。恥辱感是關於自我對自身「是」什麼的評價，罪惡感則來自於自己「做錯」什麼的行動之評價。這其中，該做什麼而沒做，也是罪惡感的來源。太明曾被日軍徵召去當軍中翻譯，參與日軍侵略中國的戰爭。不只是戰爭殺戮的殘酷折磨太明的心靈，更重要的是，他當場目睹被捕的抗日份子面臨被日軍處死的臨終時刻，其所表現的從容就義精神，使他「良心上受到譴責」（頁 206），同父異母的弟弟志南被日軍以「志願軍」名義強迫從事勞動而病亡，當志南被抬進家門時，「太明內心掀起無限憤恨」（頁 275）也使得太明「自譴」（頁 277）。

雖然自譴乍看下也是向內的情緒，但它來自於罪惡感，包括做錯事以及應做某事而未做，因此是「行動」的前導。古德溫（Jeff Goodwin）在研究農民運動時，發現農民面臨惡化的環境，初期是焦慮與恐懼，帶來內縮的傾向；若是外在壓迫力道強過他們所能忍受，內縮的情緒會轉化為憤怒而導向行動，而一起從事運動的農民凝聚在一起而有了革命情感，更帶來正面的歸屬感與愉悅感。古德溫因而認為「憤怒」具有強烈的動員效果（Goodwin, Jasper & Polletta, 2001: 16-17）。太明在中國時曾經厭惡中國人的抗日與主戰街頭運動；當他看到中國抗日份子從容就義，他的立場轉變了。整本書的敘事結構，可以說以緩慢步調鋪陳太明受殖民教育洗腦而看不出殖民體制的問題，反而嫌惡那些抵抗性的政治團體；故事進行到戰爭開始，節奏開始加快，太明從殖民體制中覺悟，情緒由內向的羞恥與自卑，逐漸轉化為具有主體能動性的憤怒。

這樣的主體能動性在書末的「瘋狂」達到最高潮。吳濁流對太明的瘋狂，其描寫其實非常曖昧。一般而言，瘋狂的人胡言亂語，但太明說的話由於憤怒而表達的力道特別強大，然而村民不但沒有視為胡言亂語，反而聽了非常感動。太明先在牆上寫詩，這恐怕不是真正瘋狂的人所能寫出來的，詩的內容抗議國家殘暴不仁，鼓勵人民崛起：

奴隸生涯抱憾多，橫暴蠻威奈若何？同心來復舊山河，六百萬民齊蹶起，誓將熱血為義死。（頁 270）

吳濁流對此刻的太明如此描述：「他的行動雖然有些離奇，似乎還不足以斷言他已經發狂」（頁 279）。附近村民聽到消息前來看熱鬧，但見太明神氣咄咄逼人，高聲朗誦，控訴當局，大聲罵道：

依靠國家權勢貪圖一己榮華富貴的是無心漢！……藉國家的權力貪圖自己的慾望，是無恥之徒，是白日土匪。……那是老虎、是豺狼、是野獸，你們知道嗎？

他的話句句使眾人十分感動。（頁 280-281）

到目前為止，太明的表現是以激昂但有條理的方式怒斥殖民政府的殘暴，因此村民的反應是「感動」。雖然最後村民仍然認為他發瘋了，可是仍有人謠傳他偷渡到對岸，在昆明從事對日廣播。但究竟是否如此？吳濁流又寫道，「都沒有人能證實」（頁 282）。吳濁流故意留下一個開放式的結局，可說是暗示台灣人的命運就是不斷移動，但移動的目的地、原因、動機又因人而異。此處筆者想要強調的是「發瘋」或是陳映真所謂的「佯狂」與其說是變成不正常的狀態，不如說是恥辱主體在累積多年的自卑、消極、畏縮後，終於要猛烈一跳前的預備狀態。

太明看似個性被動消極，其實他不斷地移動，移動本身就是一種自我反思以及對體制有意或無意的批判。他第一次移動是因為遭受久子拒絕，因而他前往日本。這個行動潛藏著對日本差別主義的反抗，只是太明自己仍未覺察。此後他回台，不久後到中國，待了一段時間又回台，全書的敘事圍繞著太明往復移動的迴圈，既是重複，也在重複中製造差異。此種差異乃是其感覺結構由內向型的恥辱而逐漸轉向外向型的憤怒，而這種轉變來自於外在環境的轉變以及太明對此轉變的認知。殖民政府進入戰時體制後，對人民的剝削與管控日益嚴密，有些台灣人選擇成為皇民，趨炎附勢，而太明則是自我覺醒，擺脫過去殖民教育給他的順從，轉變為對殖民體制以及媚日的台人雙重的批判。

六、 結論

不同於以往將恥辱視為負面現象，近年來的學術研究轉而認為恥辱為推動主體「意識到自我存在」的關鍵，主體也因而拉開一道反思的距離。因為他意識到自身的缺陷、不足，致使他意欲改頭換面、重新做人，獲得他人認可。恥辱在此促動主體的自我批判

與轉化，讓主體尋求改變的契機。

恥辱與尊嚴、恥辱與自我展示都是一體的兩面。恥辱感來自於主體未受到來自他人的正面評價，而自己又接受了這種負面評價因而陷入自憐自艾，但其實恥辱感正是源於對尊嚴的追求。本論文從恥辱主體的角度分析《亞細亞的孤兒》，認為吳濁流此書的特殊之處在於他的反英雄敘事，他並未正面塑造一個積極進取的抗日英雄，反而給我們一個消極、內向、自我厭惡的負面人物胡太明。透過一連串事件而生成的恥辱主體，又因為外在不斷變化的環境，使得恥辱主體有了自我反思的機會，終於看清殖民體制的殘暴而展開又一次的旅程。

台灣居民大部分是中國移民來的漢人。起初是明朝時期的漢人，當中國改朝換代為清朝，這些人由「移民」成為「遺民」，也可說是孤兒。清朝於甲午戰爭戰敗後，將台灣割讓給日本，讓台灣人有更清楚的孤兒意識。如此說來，中國彷彿是父母，而台灣是被父母遺棄的孤兒。但吳濁流此書並未取名為「中國的孤兒」，而是「亞細亞的孤兒」，說明台灣人尷尬矛盾的處境並非單純來自於被中國拋棄，而是來自於中國與日本兩國在東亞地緣政治下互動而產生的台灣孤兒意識。更精確地說，台灣不是被中國拋棄的孤兒，台灣是擠壓在中日兩國互動過程中而產生的孤兒情境。孤兒是複雜的互動過程產生的「情境」，而非身分認同。太明從一開始就清楚知道自己是「台灣人」，他的追尋，並非缺乏身分認同而展開人生旅程，而是在恥辱感中體會到台灣人的身分認同是一個「問題」，而這個問題，必須靠空間移動來處理。這個問題只能被處理，無法得到終極的解決。在似乎無止境的移動中，太明逐漸由恥辱主體展開能動性，這就是《亞細亞的孤兒》一書的成就；此書肯定了台灣人意識，但全書的空間移動與曖昧開放的結局，都未將台灣人主體固定與封閉，而是保持流動與開放，在不斷移動中增加了台灣人主體的深度。

（責任校對：邱藍萍）

引用書目

一、中文書目

- 吳濁流，1980，《亞細亞的孤兒》，台北：遠景。[Wu, Zhuo-liu. (1980). *Orphan of Asia*. Taipei: Vista.]
- 宋冬陽，1984，〈朝向許願中的黎明：試論吳濁流作品中的「中國經驗」〉，《文學界》，第 10 期，頁 127-146。[Song, Dong-yang. (1984). Toward Dawn in Wishing: Chinese Experiences in Wu Zhuo-liu's Literary Works. *Literary Community*, 10, 127-146.]
- 宋澤萊，2011，〈論吳濁流長篇小說《亞細亞的孤兒》裡的否定：並論悲劇裡主體性的初萌〉，收錄於宋澤萊，《台灣文學三百年》，台北：印刻，頁 255-270。[Song, Zhe-lai. (2011). The Negativity of Wu Zhuo-liu's Novel *Orphan of Asia*: The Origin of Subjectivity in the Tragedy. In Zhe-lai Song, *Taiwanese Literature 300 Years* (pp. 255-270). Taipei: Ink.]
- 李木蘭著、高亮譯，2007，〈反對中國婦女參政：面對政治現代性〉，收錄於游鑑明、羅梅君、史明主編，《共和時代的中國婦女》，台北：左岸文化，頁 177-201。[Edwards, Louise. (2007). Opposition to Women's Suffrage in China: Confronting Modernity in Governance (Liang Gao, Trans.). In Chien-ming Yu, Mechthild Leutner & Nicola Spakowski (Eds.), *Women in China: The Republican Period in Historical Perspective* (pp. 177-201). Taipei: Rive Gauche.]
- 李育霖，2008，〈台灣作為方法：重讀吳濁流《亞細亞的孤兒》〉，收錄於李育霖，《翻譯闖境：主體、倫理、美學》，台北：書林，頁 166-210。[Lee, Yu-lin. (2008). Taiwan as Method: Rereading Wu Zhuo-liu's *Orphan of Asia*. In Yu-lin Lee, *Liminality of Translation: Subjectivity, Ethnicity and Aesthetics* (pp. 166-210). Taipei: Bookman Books.]
- 李郁蕙，2002，〈戰後的日本語文學與「性差化」〉，收錄於李郁蕙，《日本語文學與台灣：去邊緣化的軌跡》，台北：前衛，頁 97-122。[Lee, Yu-hui. (2002). Postwar Japanese-Language Literature and "Gender Differentiation". In Yu-hui Lee, *Japanese-Language Literature and Taiwan: The Trace of De-Marginalization* (pp. 97-122). Taipei: Avanguard.]
- 施正鋒，1996，〈吳濁流的民族認同：以《亞細亞的孤兒》作初探〉，《法政學報》，第 6 期，頁 41-70。[Shih, Jheng-fong. (1996). The National Identity of Wu Zhuo-liu: *Orphan of Asia* as an Example. *Law and Politics*, 6, 41-70.]

- 荆子馨著、鄭力軒譯，2006，〈「在濁流中」：《亞細亞的孤兒》中的三重意識與殖民歷史學〉，收錄於荆子馨，《成為「日本人」：殖民地台灣與認同政治》，台北：麥田，頁 233-277。[Ching, Leo Tse-hsing. (2006). "Into the Muddy Stream": Triple Consciousness and Colonial Historiography in *The Orphan of Asia* (Li-hsuan Cheng, Trans). In Leo Tse-hsing Ching, *Becoming Japanese: Colonial Taiwan and the Politics of Identity Formation* (pp. 233-277). Taipei: Rye Field.]
- 梅嘉樂著、孫麗瑩譯，2007，〈挑戰／定義現代性：上海早期新聞媒體中的女性〉，收錄於游鑑明、羅梅君、史明主編，《共和時代的中國婦女》，台北：左岸文化，頁 256-310。[Mittler, Barbara. (2007). Defy(N)ing Modernity: Women in Shanghai's Early News-Media (1872-1915) (Li-ying Sun, Trans). In Chien-ming Yu, Mechthild Leutner & Nicola Spakowski (Eds.), *Women in China: The Republican Period in Historical Perspective* (pp. 256-310). Taipei: Rive Gauche.]
- 陳芳明，1998，〈戰後台灣大河小說的起源：以吳濁流的自傳性作品為中心〉，收錄於陳義芝主編，《台灣現代小說史綜論》，台北：聯經，頁 84-99。[Chen, Fang-ming. (1998). The Origin of Roman-Fleuve in Postwar Taiwan. In Yi-chih Chen (Ed.), *Essays of Taiwan Modern Novel History* (pp. 84-99). Taipei: Linking.]
- 陳映真，1980，〈試評《亞細亞的孤兒》〉，收錄於吳濁流，《亞細亞的孤兒》，台北：遠景，頁 45-62。[Chen, Ying-zhen. (1980). The Comment of *Orphan of Asia*. In Zhuo-liu Wu, *Orphan of Asia* (pp. 45-62). Taipei: Vista.]
- 彭瑞金，2008，〈解讀《亞細亞的孤兒》〉，《文學台灣》，第 68 期，頁 37-46。[Peng, Ruei-ching. (2008). Interpreting *Orphan of Asia*. *Literary Taiwan*, 68, 37-46.]
- 黃信洋，2009，〈多重認同與台灣人意識：吳濁流《亞細亞的孤兒》的一種解讀〉，《客家研究》，第 3 卷第 2 期，頁 137-164。[Huang, Shin-yang. (2009). Multiple Identity and Taiwanese Consciousness: An Interpretation of Zhou-liu Wu's *Orphan of Asia*. *Hakka Studies*, 3(2), 137-164.]
- 詹閔旭，2012，〈恥辱與華語語系主體：施叔青《行過洛津》的地方想像與實踐〉，《中外文學》，第 41 卷第 2 期，頁 55-84。[Zhan, Ming-xu. (2012). Shame and the Sinophone Subject: The Idea and Practice of Locality in Shi Shu-ching's *Walking through Lo-Chin*. *Chung Wai Literary Quarterly*, 41(2), 55-84.]
- 藍建春，1997，〈胡太明的祖國經驗：《亞細亞的孤兒》中的國族想像、瓦解與再擬構〉，《水筆仔》，第 2 期，頁 4-19。[Lan, Chien-chun. (1997). The Homeland Experiences of Hu Tai-ming: De/reconstruction of National Imagination in *Orphan of Asia*. *Kandelia*, 2, 4-19.]

二、英文書目

- Ahmed, Sara. (2004). *The Cultural Politics of Emotion*. New York: Routledge.
- Goodwin, Jeff, Jasper, James M. & Polletta, Francesca. (2001). Introduction: Why Emotions Matter. In Jeff Goodwin, James M. Jasper & Francesca Polletta (Eds.), *Passionate Politics: Emotions and Social Movements* (pp. 16-17).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 Jacoby, Mario. (1994). *Shame and the Origins of Self-Esteem*. New York: Routledge.
- Radhakrishnan, Rajagopalan. (1992). Nationalism, Gender and the Narrative of Identity. In Andrew Parker, Doris Sommer, Mary Russo & Patricia Yaeger (Eds.), *Nationalisms and Sexualities* (pp. 77-95). New York: Routledge.
- Sedgwick, Eve Kosofsky. (2003). *Touching Feeling*. Durham: Duke University Press.
- Solomon, Rober C. (2004). Emotions, Thoughts, and Feelings: Emotions as Engagements with the World. In Rober C. Solomon (Ed.), *Thinking about Feeling* (pp. 1-18).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Tsai, Chien-hsin. (2013). At the Crossroads: *Orphan of Asia*, Postloyalism, and Sinophone Studies. *Sun Yet-sen Journal of Humanities*, 35, 27-46.